

WHAT PHILOSOPHERS THINK



〔英〕朱立安·巴吉尼
Julian Baggini 编
杰里米·斯唐鲁姆
Jeremy Stangroom

王 婧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想什么

哲学家在

哲学家在想什么

〔英〕朱立安·巴吉尼

Julian Baggini

杰里米·斯唐鲁姆

Jeremy Stangroom

编

王 婧 译

B0-53

6

2006

WHAT PHILOSOPHERS **THINK**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家在想什么 / (英)巴吉尼, (英)斯唐鲁姆编; 王婧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10

ISBN 7-5426-2398-2

I. 哲... II. ①巴... ②斯... ③王... III. 哲学—文集 IV. B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6736 号

哲学家在想什么

编者 / [英] 朱立安·巴吉尼 杰里米·斯唐鲁姆
译者 / 王 婧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特约编辑 / 董志德

封面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sh.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15 千字

印 张 / 14.5

ISBN 7-5426-2398-2

C·163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导言 哲学家在想什么	(1)
------------------	-------

I. 达尔文的遗产

1. 达尔文与伦理学	彼得·辛格(11)
2. 达尔文,自然与人类的自大	珍妮特·雷德克里弗·理查兹(21)
3. 进化论心理学	海伦娜·克隆宁(29)
4. 基因与决定论	理查德·道金斯(39)

II. 科 学

5. 科学与相对主义	艾伦·索卡尔(51)
6. 作为新哲学的科学	爱德华·威尔逊(60)
7. 科学与宗教	罗素·斯坦纳德(67)
8. 科学、伦理学与社会	约翰·哈里斯(76)

III. 宗 教

9. 非实在论的上帝	唐·库比特(87)
10. 自由与恶	理查德·斯温伯恩(97)
11. 宗教哲学	彼得·瓦蒂(106)

IV. 哲学与社会

- 12. 默多克与道德性 玛丽·米奇利(117)
- 13. 正义与冲突 斯图亚特·汉普希尔(125)
- 14. 艺术的价值 罗杰·斯克鲁顿(135)
- 15. 女性哲学家 玛丽·沃诺克(144)
- 16. 鲜为人知的一面 雷·蒙克(153)

V. 形而上学

- 17. 自由意志 特德·杭德里奇(165)
- 18. 实在论 约翰·塞尔(175)
- 19. 超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乔纳森·雷(186)

VI. 语 言

- 20. 语言问题 西蒙·布莱克本(197)
- 21. 真理与意义 迈克尔·达米特(207)
- 22. 走出我们的头脑 希拉里·普特南(217)

导言：哲学家在想什么

若是想知道哲学家想些什么，最好的办法也许莫过于阅读他们的著作。为什么这本访谈录或许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这一好奇心，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简单地说，哲学家往往不会在他们的著作中确切地告诉你，对于一系列的问题他们是怎么想的。相反，他们只对于各种一般来说较为狭窄的论题，给出他们所确信为原创且有力的论证。这一反差及其意义要求我们略微作点解释。

首先，我们得清楚地认识到哲学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往往把哲学看作是某种关于观念或理论的学问。这种想法没错，正如人们一说到赌博和经商，就会联想到金钱。在赌博和商业活动中，人们通过金钱做交易，但如果你仅仅知道贸易和商业也都涉及金钱交易，那你就肯定不懂它们是什么，它们间到底有什么区别。类似地，哲学的货币是观念，它同时也是科学和宗教的货币。所不同的是这种货币的交换方式。

理性的论证使哲学观点源源不断地涌现。而恰恰是哲学问题本身引起了理性的争论，但总的来说，任何结论的得出一方面是基于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不证自明的逻辑基本原理。（哲学所援引的“证据”通常不是专门的科学数据，而是适用于一切学科的证据。它们是日常经验或既定科学中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专为哲学而设的证据。）

因而，当哲学家“走向市场”著书立言，他们所表达的不完全体现其思想。他们只是把自己坚信并一直坚持的有力的、可提供证明的、富有争议的根据拿出来讨论。他们并不阐明“他们想些什么”，而是表明他们有

充分的理由足以相信什么。这使得哲学工作具有价值。如果哲学家仅仅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那我们只会吞下过量的思想而导致消化不良,这对于我们明辨是非毫无助益。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业余”哲学研究者(即独立于学院之外工作的哲学家)往往易于失败。他们总是仓促地把自己所有想法付之于纸上,可是对这些想法要么就是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要么提供的就都是些草率、不充分的证明。接着,他们诧异竟没有一个严肃的出版商对出版他们的著作抱有兴趣。在这点上,学院派的哲学家则因为自己的著作被同事细读进而吹毛求疵而受益匪浅。独立的哲学家往往不得不完全依靠自我评价,因而很难作出全面的自我批评。这或许是为什么很少有像样的哲学体系出自学术界之外的主要理由,而不是能力不足或存有偏见。

然而,尽管对思想的这种过滤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它着实剥夺了我们头脑中一些有趣的东西。不管这些哲学家们是多么的才华横溢,这种对思想的过滤对于他们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因此,即使是每个时代最出色的哲学家,也只是倾向于公开那些有“工业标准”支持的论证所构成的想法。当然出版界的这种过滤作用确实也能一煞某些精英的锐气,但另一方面一些哲学“巨星”即使脱离一般的论证标准也能发表自己的著作,而不是像他们的同行那样因默默无闻而抱憾不已,这些都是事实。但这些都无一不是例外。大体上,即便是顶尖的哲学家也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则:不要告诉人们你想些什么;只要告诉人们你能提供强有力的、理性的论证来支持什么。

总的来看,这不是一桩坏事。然而仍有一些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至少有时候,我们还是想要拓宽一下视野,来看一看对于那些不必要给出有力论证的东西,哲学家是怎么想的。

理由之一,即毋庸置疑,哲学家作为独立的个体,常会把他们自身的一些特质带到他们的专业著作中。那种认为哲学只存在于某些客观、纯粹理性领域内的想法无疑是荒谬的,这使得许多有志于哲学的人望而却步。读一下任何一位哲学家的自传,我们就能明显地发现,他们的思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的个性所形成的。举例来说,当奎因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他就享受到了“变无知为有知”的乐趣,而青年费耶阿本德则

设想这个世界是个充满魔力、神秘的地方。一想到这些思想家成熟的哲学体系，是如此凑巧地与这些预先反映出的大量的认识走向相一致，总不免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但在他们已出版的著作中，哲学家总是尽其所能地把握住他们流于纸端的文字。这就往往压抑了其自身的个性，简直到了无法彰显的程度。而在访谈这样的场合上，哲学家则较少克制，向人们展现出了更多的自我。这种个性化的东西并不会形之于特定的字句，通常也用不着参考公开的自传性材料。更确切地说，通过各种各样难以察觉的方式，这种个性化的自我会在访谈的过程中，而恰恰不是在一本本的专著中表现出来。

例如，在对彼得·瓦蒂和罗素·斯坦纳德的访谈中，较之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我们能够更强烈地感受到宗教信仰在他们的思想和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他们的著作中，瓦蒂和斯坦纳德提出并讨论了支持和反对宗教信仰的种种论证，但即使我们知道他们站在哪一边，要确定这些论证对于他们的意义到底有多大，也实非易事。而在访谈过程中，事实则显而易见：他们所持的论证并不如他们的信仰那般重要。他们靠宗教信仰过活，而诸如上帝存在与否的种种论证，赞同也好反对也罢，都不会改变他们的这种信仰。因此，如果他们的信仰得到了理性的支持固然是好，但假使没有，也无关紧要。

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因为我们从中了解到，对于许多信徒，生活和思想是如何在他们的身上交互作用着的，而这在宗教哲学的标准文本中却一点儿也得不到体现。这一发现使我们得重新考虑，上帝存在之种种论证的真实作用，而对于这些论证能够或应当确切给出人们对于上帝的种种信仰，这一普遍信念现在看来也有问题。

这个例子也表明访谈作为一种非常有用的手段，是如何进入元哲学——一门关于哲学的本质和方法的学科的。元哲学的研究领域往往隐而不显。然而在一次访谈中，它则能够部分地被突显出来。这本书中的许多访谈涉及了元哲学的话题。例如，希拉里·普特南就谈到了哲学中判断的作用，并认为有必要认识到，哲学的任一特定领域都是由人、由一个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来进行研究的。而在对约翰·塞尔的访谈中，则探究了制约理性辩护的多种方式，以及何种原则是哲学家必须遵循的，从而

哲学家在想什么

避免“本末倒置”。在访谈过程中,思想家能够从他们的著作中抽身而退,从而告诉我们一些他们是如何思考的,相反,从他们已经发表的著作中,人们则有他们通常只对潜心研究感兴趣这样的感觉。

访谈同时也为哲学家探究他们著作中的某些联系开启了一扇窗口。举个例子来说,珍妮特·雷德克里弗·理查兹对她早期关于女权主义的著作和不久前就达尔文主义和生命伦理学所发表的著作间的连续性,作了些有趣的观察。从中发现这些联系虽然并不具有自明性,但是它们一旦得到解释,就会突显出她本人研究哲学的一些重要特征(这样一来就又一次显示出了元哲学的某些特征)。

我们同样也时常看到,对于一个哲学家而言,什么才是其真正关注的东西。比如,在对彼得·辛格的访谈中,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对于那些与实践道德性(practical morality)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性的伦理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这就告诉了我们辛格对于伦理学的基本信念:伦理理论本身并不值得关注,而只有指导实践才是道德哲学的目标。

总而言之,访谈可以为我们展现出更广阔的图景。它们使我们得以从已出版的著作里哲学家详尽而复杂的论证中抽离出来,从而看清隐于哲学家背后的不同的信仰、信念和设想,正是这些东西,为他们的哲学思考提供了通常不可见的语境。访谈也使我们了解到哲学家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著作与其普遍的义务相一致的问题。正如彼得·瓦蒂在访谈中所谈到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不可能都是哲学家,他不得不用一生的时间来押注”。作为哲学家,这本书里的受访者,在论证与评价何者为重上不得不左右兼顾。而作为普通人,不管他们是否具有令其满意的哲学论证来帮助自己作决定,他们仍然不时地要在非此即彼间作出抉择。而他们会作出何种选择,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哲学家是什么?

因为这里一些受访者并非专业哲学家,因而本书的书名可能会引起误解。像艾伦·索卡尔和罗素·斯坦纳德是物理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是博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是动物学家,而唐·库比特主要是神学家。

然而，知识的王国实际上并不像标准的学科分类方式所表现的那样整齐划一。哲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而专业哲学家并不具有垄断的权利。这里每一次对“非哲学家”的访谈中，思想家们所研究过的课题都会予以讨论，而这些主题本质上首先是哲学的。所以，不管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为之，这本书中的所有话题最终都落脚于哲学，同样，书中所有的受访者也都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出现，尽管他们只是暂时客串了这个角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本书的书名与其内容并不相出入。

然而，这就着实为我们带来了相对诸如神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学科而言，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哲学这一疑问。不过这个问题过于宽泛以致我们无法在这里作出确切的回答，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指出为什么“非哲学家”最后会研究起哲学来指明答案。以索卡尔为例，答案很简单：索卡尔试图通过夸张的模仿来批判某种类型的哲学，这样一来，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成了哲学领域的不速之客。而理查德·道金斯的思想则必然引来像决定论、还原论以及科学主义这样的哲学上的问题。威尔逊的契合(Consilience)提法则以其基于对知识的本质和范围的断言，而贯穿着哲学的意味。当斯坦纳开始考虑是否可以用标准的科学手段来确定上帝的存在时，他就进入了哲学的领域。而这往往会引导人进入关于宗教信仰的本质以及它何以能够或应当得到证明的种种争论中去。库比特则因其关于宗教的著作围绕着信奉上帝意味着什么，以及是否信仰的对象必须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这些问题，而冒险进入了哲学。

在上述这些例子中，思想家无一不被卷入了像知识、信仰、存在，它们的本质及其辩明这样的普遍问题，以及诸如自由意志、决定论、上帝和真理这些核心概念中去。它们都是典型的哲学问题，因为它们所涉及的都是些仅仅凭借科学、经验的研究方法是无法理解的普遍而又基本的问题。事实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基本的智力训练，常常会引来哲学界之外的思想家参与其中。哲学处理的是那些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特殊的方法仍悬而未决的理论与抽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是科学自身的基础。所以，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非哲学家”时常自己研究一些哲学是多么不足为奇的一件事情。

话题的范围

本书所讨论的话题的范围部分出于偶然：由于这些话题碰巧是每一期《哲学家杂志》关注的焦点，也为每一次访谈提供了最初存在的理由。然而，看一下哪些话题是本书有所选录的，确实可以为我们展现一些当代学院哲学的兴趣及关注之所在：《哲学家杂志》仅仅反映了在哲学界正在发生的事件。

当然有三次访谈是关于达尔文主义这一主题并不是什么巧合。由于伦敦经济学院自然与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发起的 Darwin@LSE 计划所做的工作，使得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在哲学上对达尔文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一计划由海伦娜·克隆宁领导，她也是本书的受访者之一，正是 Darwin@LSE 项目为彼得·辛格做讲座提供了机会，而这也就成了对他访谈的焦点内容。

事实上，对达尔文的兴趣部分是由于英美哲学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趋势：自然主义的日益发展。自然主义作为一个宽泛的术语，它是指在哲学中的这样一系列路径，这些路径都试图根据自然界自身的运作，展开哲学的解释。自然主义的教父是大卫·休谟，他的道德哲学也许正是最显而易见的自然主义。休谟认为，我们无法通过对道德性的理性论证来理解我们关于对错的感觉。只有把道德性看作一种本能，一种自然培养起来的感觉，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若时间快速推进两个世纪我们会发现，试图用达尔文主义的术语来说明我们的道德本能是如此地与休谟的观点紧密相连。

现今在哲学的所有领域，都有自然主义的解释。就像所有的哲学运动，自然主义有大量的批评者。支持者把它看作根据好的科学建立好的哲学的努力，然而它的批评者却常常说这是坏的哲学和坏的科学的结合。读者们可以根据本书收录的访谈中所给出的迹象自己来作个初步的判断。

科学是本书涉及的另一个主题。有趣的是，在这一部分没有一位受访者是专业哲学家。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几年来，科学家和那些对科学

感兴趣的人都对围绕着科学的哲学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例如科学理论的地位，科学事实的本质以及其他形式的信仰或知识与科学之间的界限等。与此同时，学院派的科学哲学家一向与词藻绚丽的段落无缘。这个领域也少有重量级的人物——更别说巨人了。

这或许应该不足为奇。毕竟在哲学包罗万象的各个领域与那些仅在学术界繁荣兴旺的其他学科之间总存在着交叉错位。举例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语言哲学在学院哲学内占据着显著的地位，却不曾引起学院之外的注意。因此我们的访谈就上述主题探讨了为什么哲学仍然固执得索然乏味的原由。而对科学来说，这种不对称现象则表现为另一种方式：学院的科学哲学仅仅局限于学院之内，而公众对围绕着科学的哲学问题的兴趣却十分广泛。

有数个访谈集中归在了“哲学与社会”这个标题之下。虽然哲学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所关切的事，但它从未完全脱离过日常生活。道德、正义与艺术的问题是哲学永恒的主题，也一直是备受社会的关注。因此这些问题在这里得到表现是件很自然而然的事。

宗教哲学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个话题在《哲学家杂志》的读者中总是反响热烈，或许正是这份读者兴趣，使得在精挑细选之后把它收录在本书中。然而，如同科学哲学这一部分一样，这里不可能收录太多。毕竟在学院哲学中，宗教并不是关注的核心。确实，比起普通大众，显然学院派的哲学家基本上很少信奉宗教，且由于对宗教哲学的争论由来已久，其中的大多数哲学家已不为其所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例子说明了哲学即使依然如故仍能保持魅力的缘由。对大多数哲学家而言，关于宗教哲学的争论既无新意又无结果，但是对那些并不致力于此学科的人来说，这些争论仍然是中肯的。

以最为醒目的名字命名的哲学的分支——形而上学——同样也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这其中最为基本的形而上学问题——实在性的本质——被讨论了两次，而哲学上最古老的问题之一——自由意志——也露了脸。

作为任何一个访谈特别的焦点而我们在本书中却没有看到的是关于知识的理论（认识论）。既然它所关注的是知识是什么以及我们能够知道

哲学家在想什么

什么这样的问题，那么作为哲学中最为基本的领域，在这点上就存有争议。然而认为这一主题完全置身于本书之外的说法又有失偏颇。事实上它贯穿于爱德华·威尔逊和罗素·斯坦纳德的访谈中，但仅仅是以特殊的基本上非标准的形式。并且它潜伏在了其他多数访谈的背景中，就像晚宴中的常客，不请自来。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留心注意它幽灵般的闪现。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和何以能够认识的问题，不知道被隐含地提出过多少次，对它可能的回答也是不止一个。

访谈的来源

所有这些访谈最初都发表在 1998 年到 2002 年的《哲学家杂志》上。然而在编写这本选集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只是简单地把它们拿来重新包装一下。每个访谈都经过修订，许多由于杂志版面限制而被删减的访谈也得到了扩充。我们还在很大程度上使版式标准化，并且给出了更多的访谈背景情况以便让读者了解访谈内容的来龙去脉。这些访谈也回到了受访者那里，他们没有藉此机会修正自己的言辞，而是以令人赞赏的态度抵制了篡改历史的诱惑。

最后，我们希望，比起大多数报刊文章来，本书收录的一系列访谈能有更为长久的吸引力。

I. 达尔文的遗产

Darwin's Legacy

1. 达尔文与伦理学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彼得·辛格的经历可以说是 20 世纪晚期英语世界里道德哲学衍变的一个缩影。1969 年辛格作为研究生进入牛津大学,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处在转折边缘的人,进入了一个处在剧变中的世界。当时的道德哲学许多年来一直一无所获死气沉沉。元伦理学——对于道德判断之本质的研究——几乎是它唯一的关注,而应用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实际应做之事——却被降到了次要地位。在美国,越战和民权运动动摇了这一现状,而在英国,与此同时各种变化也浮出了水面。

辛格初到牛津的时候对动物权利并无特别的兴趣。但是,正如他在《物种之间》(*Between the Species*)里所记述的那样,是在邂逅了讲师以及诸如罗斯·戈得洛维奇、斯坦·戈得洛维奇、理查德·凯申和理查德·赖德这些同期同学们之后,开始促使他的思考发生了转变。自此辛格开始了他的智慧之旅,并从这一刻起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最知名的哲学领域的动物权利的拥护者。

他的突破性成就是《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该书出版于 1975 年。书中辛格坚持认为这样一个事实:动物有知觉会觉得痛,因此我们有保卫它们幸福的道德义务,而这在实践上意味着真正的禁止活体解剖以及完全的素食主义。但需要注意的是,辛格总是严格按照功利主

义的原理来进行论证——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有感觉的生物(sentient creatures)的偏好,而避免那些会妨碍这些偏好的事物。然而,想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一原理的渴望很可能就是引发绝大多数争论的原因。而且这种做法对动物权利的强硬倡导者来说,也意味着他还不够彻底。然而,更富有争议的是辛格有关人类生命的主张。他坚持认为,既然是感觉(sentience)或意识赋予生命以价值,那么一个未出世的孩子、一个新生儿或者一个精神极度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命的价值也就要比许多动物的生命的价值来得低。正是因为他坚持此类主张,坚持他立场的一贯性的意愿,因此招致了各种各样的抵制、抗议以及不计其数的指责,指责他“罪恶”、指责他是一名“纳粹”。

当我见到彼得·辛格的时候,他显得非常疲倦。在这一次英国的演讲旅途中,他的坏名声又一次为他招来了媒体连续几个星期的详细报道、歪曲和批评,而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辛格此次英国之行是为了探讨“达尔文左派”(A Darwinian Left)的问题,然而他刚一下飞机,《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就重新提起了有关辛格的这一观点——在某些情况之下,以一种人道的方式结束一个精神极度残疾的婴儿的生命,或许比用尽一切可用的现代医学手段来延续他痛苦而又往往短暂的生命要更为可行——所引发的一场由来已久的争论。尽管辛格在广播4台的“今日”(Today)节目里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护,但是在这么简短的新闻节目里,他的冷静的推理总显得不如对手煽情的辩解来得那么有影响力。

为此,辛格所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再一次为他的坏名声所掩盖。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达尔文左派?”(A Darwinian Left?)是他此次来访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演讲当中,辛格向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禁忌发起了挑战:左翼思想对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观的排斥。

辛格坚持认为,左翼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忽视了人性,因为他们否认了有人性这么一种东西。对马克思而言,正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使我们成为我们这样的人,所以,正如辛格所指出的那样,“从这一信念必然得出这么一种看法,即,如果你能够改变‘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你就能